共相与异相之间：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些省思①

潘光哲

一、序论

“辛亥革命”的研究，早已蔚为大观，特别在挣脱以意识形态先行的“正统史学”②之钳制以后，现今史界同仁探讨的视野，渐趋宽广，观察的角度，更趋多元。那种漫笔挥洒“辛亥革命与社会变迁”广袤历史图景的成果③，不再是研究的主要思路；对于“革命”行动和思潮勃然而兴的年份，已可进行细腻的描摹④；甚至检讨当事者执笔之史著，如何打造了“辛亥革命”主流历史记忆的基础，也成为史家着意的课题⑤。因此，如何在前行研究的基础上，别辟新径，另启新衢，让我们对“辛亥革命”的认识，愈形丰赡，实为后起学人应该肩负的责任。本文之作，拟从比较广泛的思想脉络的视野，略示一二，期可提醒吾辈同好，“辛亥革命”的研究，仍有无限的天地，正等待着后继学人施展身手，好让前行者的栽植，长青永茂。

二、“革命”和“改革”之间的交光互影

在广义的“辛亥革命”时期，“革命”和“改革”好似两相对立不可调和的政治抉择。

---

① 本文在笔者前撰《研究近、现代中国民主共和思想的回顾与省思》（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》）、《关于“告别革命”的历史书写——以一九〇三年为例的一些思考》等文的基础上，删易而成，谨此说明。

② 即如谢文孙的观察，研究广义的辛亥革命史，有两大“正统学派”：一是1928年以后的中国国民党的“正统学派”（the orthodox school），以孙中山为中心理解角度；一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“新正统学派”（the neo-orthodox school）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讨论（Winston Hsieh，*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：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*〔Stanford，CA：Hoover Institution Press，1975〕）。

③ 例如：赖泽涵：《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迁》，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：《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，第357～371页。

④ 严昌洪、许小青：《癸卯年万岁：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。

⑤ 罗福惠、王倩：《当事人笔下的历史书写对湖北辛亥志士有关首义史著的梳理与评论》，《江汉论坛》2010年第9期。

© 1994-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可是，怀持“革命”意念的和持守“改革”立场的人物，往往分润共享相似的思想关怀。

1905年春天，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碰了面。会面时，严复表示：“以中国民品之劣，民智之卑，即有改革，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，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。为今之计，惟急从教育上着手，庶几逐渐更新乎！”孙中山的反应是：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！君为思想家，鄙人乃执行家也。”双方的晤谈，显然不太愉快①，二者的人生道路，更是南辕北辙。已然翻译出版了《天演论》、《群己权界论》等书，并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严复，更孜孜不倦地着手于《法意》等书的翻译工作②。就在这一年的8月20日，孙中山与流亡日本的各方革命志士组成了中国革命同盟会，并在1906年冬天制定了《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》③，就革命的目标、程序等面向提出了相当程度的规划。

表面上看起来，严复与孙中山双方对建设未来“理想中国”的努力路向，差异很大。然而，对中国创发民主共和体制的必要条件而言，他们却拥有一致的认识。严复盛赞“民主者，治制之极盛也”，却认为要“民之智、德、力”达到一定的标准，才能实现④，以“民智、民力、民德”为富强之本的严复⑤，一直认为中国国民不具备此一条件，不适宜采用民主共和政治体制⑥。相对的，很早就誓言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孙中山⑦，在他的“训政论”里则强调，由于中国国民缺乏知识与政治能力，因此必须“创一过渡时期为之补

---

① 王蘧常：《民国严几道先生复年谱》，王云五主编：《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》第13辑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，第74～75页；参见陈锡祺主编：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，第335页；此事《国父年谱》（增订本）未载，见罗家伦主编，黄季陆、秦孝仪、李云汉增订：《国父年谱》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第4次增订本。

② 关于严复翻译各式西方名著的目录，参见王栻：《严复与严译名著》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：《论严复与严译名著》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，第11页；贺麟：《严复的翻译》，第29页。

③ 《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》，《国父全集》第1册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，1973年，第285～311页；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：《孙中山全集》卷1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，第296～318页。

④ 他说：“民主者，治制之极盛也。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，其民主乎？虽然，其制有至难用者。何则？斯民之智、德、力，常不逮此制也。”见孟德斯鸠著，严复译：《法意》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，第158页的按语。严复又说：“民主之制，乃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。”见亚当·斯密著，严复译：《原富》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，第474～475页的按语。

⑤ 如严复说：“至于其本，则亦于民智、民力、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。果使民智日开，民力日奋，民德日和，则上虽不治其标，而标将自立。”见《原强》，王栻主编：《严复集》第1册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，第14页。又说“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，其民力、民智、民德三者之征验也，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。于是一政之举，一令之施，合于其智、德、力者存，违于其智、德、力者废。”见《原强（修订稿）》，《严复集》第1册，第25页，严复类似的言论很多，不详举。

⑥ 如他说：“鄙人愚戇，总觉共和国体，非吾种所宜。就令比踪英、法，亦非甚美可愿之事……”见严复：《与熊纯如书（11）》，《严复集》第3册，第611页。又说：“总之，鄙人自始洎终，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治体，尝以主张其制者，为四万万众之罪人，九幽十八重，不足容其魂魄。然今之所苦，在虽欲不为共和民主而不可能……”见严复：《与熊纯如书（101）》，《严复集》第3册，第711～712页。

⑦ 孙中山的主张历经的演变过程，不详论；Marianne Bastid-Bruguire引用了一些新数据（如前此之学者不曾引用的法国外交部档案），结合原有的材料，加以疏理（Marianne Bastid-Bruguire, “Sun Yat-sen's Republican Idea in 1911,” in: Eto Shinkichi and H. Z. Schiffrin ed., *China's Republican Revolution* 〔Tokyo: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, 1994〕, pp. 209-217）。

© 1994-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

救”，“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，实行地方自治”①。显然，他们对于中国是否该实行民主共和体制，即使持论大有不同，彼此的思考焦点却是一致的：中国的国民还不足以承担起身为民主共和国之主人翁的责任，还不能享有民主共和国的国民应该有的一切权利/权力，必须经过一番“改造”、“训导”过程，始能享权利，中国始能列居民主共和国之林。

就19、20世纪之交的思想脉络来看，严、孙的共同关怀，并非个例。持改革维新立场但反对推倒既存清朝皇权的知识分子，抑或是力主反满、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革命派知识分子，都分享着这一个共同的观点。主张“建设新政府”的革命党人面对中国人“政治思想之薄弱，政治智识之缺乏，政治能力之幼稚”，不能“建设新政府”的质疑，则应之曰必须经过训练过程，“开浚人民之政治思想，培养人民之政治智识，习炼人民之政治能力”②；驻节西方国家多年、有西方生活经验的黄遵宪③，一方面既说中国国民“绝无政治思想”，若“分之以权，授之以政”，必至弊端丛生，所以他强调“地方自治”，以“开民智”、“伸民权”，并提出具体的入手办法④，但他另一方面又说“留美三载，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”，整体的思想倾向是持君主立宪体制的⑤。

因此，政治立场的差异，不等于思想关怀的差别。就在同一个时间点上，历史舞台的前行者，分享着共同的思维理念；以“革命”和“改革”的二元对立架构，根本不能解释他们的思想世界里的交光互影。

---

① 整体论述，见《孙文学说》，《国父全集》第1册，第466～470页；《孙中山全集》卷6，第207～211页（文长不具录）。

② 汉驹：《新政府之建设》，《江苏》第5期（1903年8月），第22～24页；本文引用的版本是：罗家伦主编：《中华民国史料丛编》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初版。

③ 黄遵宪在1876年受命随何如璋使日，翌年成行，1882年调美国旧金山总领事，1885年返中国，1889年受命任驻英使馆参赞，翌年成行，1891年受命任驻新加坡总领事，1894年调返，此后虽曾在1896年拟命为使英、使德大臣，然均未果。参见吴天任：《清黄公度遵宪先生年谱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，各年纪事。

④ 这是黄遵宪在光绪二十八（1902）年十一月致梁启超信里的观点，文长不具录，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：《黄遵宪致梁启超书》，《中国哲学》第8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，第384～385页；又见吴天任：《清黄公度遵宪先生年谱》，第193～195页。此段内容，丁文江等编：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，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，并未录载。

⑤ 这是黄遵宪在光绪三十（1904）年七月四日致梁启超的信里的话，原文是：“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，何其与仆相似也。当明治十三四年，初见卢骚、孟德斯鸠之书，辄心醉其说，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。既留美三载，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，自是以往，守渐进主义，以立宪为归宿，至于今未改。”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：《黄遵宪致梁启超书》，第379页，又见丁文江等编：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，第195页，吴天任：《清黄公度遵宪先生年谱》，第217页。黄遵宪最后一首诗作中云，他出使日本时，“乌知当是时，东海波腾沸。攘夷复尊王，佥议以法治。立宪定公名，君民同一体。果遵此道行，日几太平世。我随使槎来，见此发深喟。呜呼专制国，今既四千岁。岂谓及余身，竟能见国会。以此名我名，苍苍果何意！人言廿世纪，无复容专制。举世趋大同，度势必有至”。见黄遵宪：《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》，《人境庐诗草》卷11，本文引用的版本是：黄遵宪著，钱仲联笺注：《人境庐诗草笺注》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，第385～386页；此诗系年为光绪三十（1904）年冬，见吴天任：《清黄公度遵宪先生年谱》，第222、263～264页，可以想见他对君主立宪体制的赞誉与中国推行此一体制的向往。

© 1994-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三、多重的“革命想象”

“革命”当然是号召革命党人集结成伍的大旗；可是，扛着“革命”这面旗帜要往哪个方向前进，革命党人却未必有共同的认知。可以说，“革命理想”的设定，绝非铁板一块，毫无差异。各式各样的“革命想象”，也是共竞并争，彼此之间未必密合交集，全无罅隙。

奉革命之名，革命党人结成“连理”，对“革命理想”的设定，却早有不同。当孙中山与杨衢云等人组成的辅仁文社相结，建立兴中会总机关部之后，双方之间，并非“水乳交融”，曾为争夺会长而有激烈的冲突①，双方更为“共和制度”、“民国”而“大闹，几至用武”②。姑且不论此事是否属实，至少从与杨衢云相善而与孙持敌对立场的谢缵泰之行事与言论来看，普遍流行的视早期革命党人都是在为“民主”、“共和”而奋斗的观点，就值得仔细疏理。热心革命的谢缵泰，自有行动，于1903年拟在广州发动武装革命行动③。身为策动者的他④，却表示说，“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，‘共和政体’的政府形式太先进了”，因之，他拟以“执政（Protector）为名，成立联邦政府”⑤，至1903年1月25日发动行动时，发布檄文，声明其“宗旨”是：

> 专为新造世界，与往日败坏之世界迥然不同，而脱我汉人于网罗之中，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。天下平后，即立定年限，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，以理国事⑥。

对于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，好似举棋不定。再如，1907（丁未）年9月的防城之役⑦，标举“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，扫专制不平之政治，建民主立宪之政体”，起事领袖王和顺本是会党出身的绿林好汉⑧，他们对这等誓词能有多少理解，不免启人怀

---

① 袁鸿林：《兴中会时期的孙杨两派关系》，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、湖南省历史学会编：《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》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，第10～11页。

② 刘成禺曾记述孙中山及陈少白之言，谓孙最初“于共和制度，尚有出入”，杨衢云则主张“非造成民国不可”，两人“大闹，几至用武”。见刘成禺：《先总理旧德录》，《国史馆馆刊》创刊号，1947年12月，第48～49页；不过，刘成禺的这段记述是否属实，难以考究。

③ 这一次革命行动的大概情况，参见张玉法：《清季的革命团体》，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再版，第237～244页；冯自由：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上编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8年，第118～125页。

④ 张玉法即说这次行动“由谢缵泰策动”，参见《清季的革命团体》，第238页。

⑤ 谢缵泰著，江煦棠、马颂明译：《中华民国革命秘史》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：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，第305页。

⑥ 《大明顺天国元年南粤兴汉大将军申明纪律告示》，柴德赓等编：《辛亥革命》第1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，第324页；至于这场行动发布的其他政治主张，不详述。

⑦ 这一次的起义大概情况，参见冯自由：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中编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，第174～180页；章开沅、林增平主编：《辛亥革命史》中册，人民出版社1980年，第248～251页。

⑧ 王和顺以“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”名义发表《告同盟诸兄弟暨吾乡父老书》，大略云：“本都督少居父母之邦，长怀四海之志。……及从孙文先生游，得与闻治国之大本，始知民族主义足以复国，未足以强国，必兼树国民主义，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，扫专制不平之政治，建民主立宪之政体，行土地国有之制度，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。”其并有四言布告，大略云：“立军政府，合众共治。”丁未九月初二日新加坡《中兴日报》，转引自《国父年谱》，第333～334页。

© 1994-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疑①。因是，“革命理想”的设定，各有向往，“革命想象”的表述，也是各式各样，假若千篇一律地诠释早期革命党人如何为“民主”、“共和”奋斗，不免把历史简单化了。当然，如果从宏观整合性的角度，舍异求同，勾勒“革命理想”的一致性，提炼出清晰的概念，自有助于我们对革命党“革命理想”的认识，朱浤源论证孙中山的“平民之学”（demosology）一词是革命党机关报《民报》的革命理论②，即为一例。显然，后继研究者应该出以多元化的思虑，开展比较精细的疏理，始能有助于我们对错综复杂的历史图像的认识与理解。

小　结

对既有的课题进行研讨与思考，都受制于个人的一圉之见，本文也不例外。况且，本文并不是“辛亥革命史学史”的全面整理，只是就相关课题，稍做勾勒述说，阙漏必众。然而，野人献曝，区区之意，但在提醒吾辈同好，在“革命”怒涛的表层之下，其实是一片共流同行的汪洋大海。毕竟，历史舞台上的前行者，千样万态，彼此之间，固然或有“革命”、“改革”的不同抉择，或有“共和”、“立宪”的不同政见；只是，他们的行动与思索，既有相互纠结冲激碰撞的时候，也有孑然一身直道而行的时刻。研究“辛亥革命”时代的思想世界，纯粹以政治立场的差异为范畴为判准，实在难以勾勒完全，共相与异相之间，存在着宽广的交叉地带。后继者不该只是停留在“漫笔洒遍天下胜景”的泼墨式层次里，而应该细致地从当时的思想环境与脉络里进行考察，就同一时间坐标定点，综合评述各家议论之同调与歧异，创造可再行突破的空间。否则，长篇累牍，呼卢喝雉，图画鬼雄，不过是包装着学术外衣的数据堆积，对增长我们的历史知识，必然无所助益。

（潘光哲：台北近代史研究所）

① 耿云志认为，反满的民族主义才是王和顺他们“生死以之”的奋斗宗旨。参见耿云志：《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辛亥革命的结局》，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：《孙中山和他的时代：孙中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中册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，第1033～1034页。

② 朱浤源：《同盟会的革命理论》，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再版，第5章。

© 1994-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